

浅析傈僳族风俗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张永华, 付建红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除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家庭与社会中,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获取知识和能力以适应该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过程。傈僳族在汉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同化下, 依旧保留着本民族古老而纯朴的风俗, 他们世代沿袭, 并潜移默化地“模塑”下一代——神秘的宗教崇拜, 奠定了儿童的灵魂信仰; 怪异的民族禁忌, 规范了儿童的人际行为; 奇丽的民族艺术, 建构了儿童的种族意识; 独特的传统节日, 开辟了儿童的精神乐园。

【关键词】傈僳族; 风俗;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091-04

社会性发展是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取得社会生活资格、获取社会生存技能的“进化”过程。在不同的文化中,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内涵。除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家庭与社会中,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获取知识和能力以适应该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体来说, 儿童期的社会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必须的——从个体的角度看: 个体出生后, 他必须熟悉一定社会的生活、生存方式, “内化”该社会的道德意识、行为准则, 学习各种必备的能力与技能, 才能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从社会的角度看: 任何民族只有持续不断地准备新一代去填补老一代的退伍与死亡产生的空缺, 社会才能得以进步, 即儿童只有通过社会性发展, 社会自身才能得以发展与“再生产”。由此可见, 任何民族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过程, 实际上是该种族社会文化的传承过程, 它是在一定地域民族文化与其他亚文化的长期荫庇下, 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本文所讨论的傈僳族风俗对该民族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傈僳族及其风俗

傈僳族在唐代称为“栗粟”。公元八世纪,

傈僳族的先民们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怒江地区。在十七、十八世纪中, 大批傈僳族迁入云南德宏、临沧、耿马等地, 部分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绿劝、大姚等地繁衍生息。目前除主要聚居区云南的怒江外, 其余分布在丽江、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以及四川的盐源、盐边、木里、德昌等地。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傈僳族人口数为 634912。傈僳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原有结构不完整的文字, 经 1957 年的创制, 形成了现在通用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并在怒江等地推行。

傈僳族在汉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同化下, 依旧保留着本民族古老而纯朴的风俗。他们信奉原始宗教, 崇拜自然, 相信万物有灵; 他们有自己的习俗、禁忌和传统节日; 他们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傈僳族均居住在偏远落后的高山与河谷, 他们长期从事山地农耕, 由于生产技术简单, 管理手段落后, 使得他们必须为求生存而努力, 因此他们没有更高的物质与精神追求, 人们总是安于现状、恪守习惯, 对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不愿作过多地改变; 闲暇之余, 他们喜欢串寨喝酒、唱歌跳舞及狩猎, 甚至对各种鬼神的祭祀活动, 也成了他们调剂精神的一种主要方式。千百年来, 傈僳族儿童在这种“纯净”的民族文化中, 潜移默化地将传统社会的需求, 内化为模塑自我个性的目标, 以此获得

收稿日期 2006-09-08

作者简介 张永华(1968-)男, 心理学副教授, 西昌学院、凉山州“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从事人格心理研究。

个人生活与生存的需要，也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原有社会结构的持续运转。

二、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是指儿童在与他人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情感和观念以及这些方面随着年龄而发生的变化。^[1]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又称为儿童社会化。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 (Judith Rich Harris) 认为，社会化是儿童被其所在社会接纳的过程，是儿童通过学习逐渐成为一个有明确行为、语言、技能，恰当信念和态度的社会成员的过程。^[2] 在这一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只能在父母的社会中“建构自己”与“发现自己”，并在同辈团体中发展自己。社会性发展过程是个体持续一生的经验积累与信念形成的过程，它需要完成两大任务：(1) 个体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2) 个体必须具备按规范行动的品质。在这个进程中，儿童“吸取”周围文化和亚文化群的价值观、风俗、习惯，“消化”知识、语言、社会行为规则、价值观、交往技能等，从而使自己与社会融为一体，并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行动，从一个生物性的个体“进化”为社会性的个体。

个体总是生活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人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塑造物，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生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存在。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中，都存在亚文化、主文化和强势文化。主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为民族大多数成员认可；而亚文化通常体现的是民族成员自身形成的价值观。^[3] 这二者的区别，通常会给人一种错觉：主文化是强大的和重要的，而亚文化是弱小的和次要的，但主文化不一定是强势文化。决定何种文化更为重要和强大，主要是看其实际影响力的大小，有时那些亚文化的力量足以使得主文化显得软弱和苍白。^[4] 对民族文化自身多元属性的理解，将为我们认识儿童社会性发展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今的儿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所遭遇的困惑和接受的信息是不同的，对于成长和发展中的儿童来说，他们面临的与其说是学习现成的社会主流文化，还不如说是与成人一起共同建设的新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文化以及社会的多元化，要求对价值观、道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多元文化中的含义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必须摆脱

多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主文化”和“亚文化”的二元思维模式，而通过相互交流与碰撞的多元文化展开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认识。傈僳族群居和杂居在相对封闭的横断山山麓，他们以自然经济为主，而且拥有独立的民族语言文字，其民族的强势文化带来的民族成员间的互动对民族成员、尤其儿童的价值观的广泛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傈僳族风俗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意义

个体的社会化是在社会中进行，需要经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的途径。美国的 W·奥格本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以保持社会文化的延续过程。G·米德认为，社会化是人不断地把别人态度内化，并学习按照社会上一般人的期待来判断和调节自己的行为的过程。^[5] 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等的总和，民族风俗是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重要信息与特殊符号，它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傈僳族的风俗，古老而纯朴，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性，对该民族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效。

1、神秘的宗教崇拜，奠定了儿童的灵魂信仰

傈僳族信奉多神，崇拜自然，仅信仰的“鬼灵”就有白加尼（天鬼）、海夸尼（家鬼）等 30 余种。他们认为，鬼灵主宰着这个世界，降福祸于人间，所以人们在开荒、盖屋、狩猎等活动之前，必须请巫师卜卦问吉凶。猎人认为，山神和猎神是保佑自己狩猎丰收的鬼灵，出猎前，必须请巫师“尼扒”、“东巴”或德高望重的老猎人主持祭山神和猎神的仪式，并杀牲献酒，祈求鬼灵保佑，并用竹签、鸡骨卜卦，求问吉凶。到了狩猎地点要鸣枪或吹牛角号向山神表示谢意，请山神归位。途中每遇岔口，猎人都要吹牛角号以示谢神。傈僳族的宗教崇拜是对虚无的精神帝国的敬奉与顺从，它为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提供了灵魂支柱与精神信仰，并在维系社会关系、传承民族文化、参与社会教化、丰富民众生活等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调剂作用。

2、怪异的民族禁忌，规范了儿童的人际行为

禁忌带有“实践经验”与“天赋法则”的原始神秘性，它在约束个体、规范群体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傈僳族有不少的禁忌。诸如：月圆之时，

忌上种;七、八月间,怕触怒山神,忌织麻、砍树与抛石入塘;认为蜘蛛是教人织布的,忌打死蜘蛛;认为山上的湖泊都是龙王的海域,忌在湖旁喧哗与投掷石棒;村里死人,忌吃辣椒、生姜和葱,因为只有与死者有仇的人才会故意吃辣椒;不能与外人吵架、哭闹与打骂畜禽,尤其新年忌吵嘴、做客、出远门等;家人出门忌哭啼、扫地;忌用扫帚赶牲畜;忌在人群中放响屁、说脏话;晚辈忌在长者面前吸烟;路遇长者要主动立于路下方;黄昏时出入须随手关门以免鬼趁机而入;忌客人从前门直走到后门,认为死人出殡才这样;忌在别人家里吹口哨;孝子不能进别人家屋;忌横跨火塘神台;忌念“尼扒”所念之经。凡此种种,均为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与行为规范。

3、奇丽的民族艺术,建构了儿童的种族意识

美有熏陶,心有感悟。傈僳族人民能歌善舞,凡遇结婚、盖房或收获时节,总要尽情歌舞。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大量富于民族特色和生活感染力的诗歌曲调,内容可分为生产调、盖房调、收获调、逃婚调等。曲调有的高亢激昂,有的低沉感伤。演唱时,往往配以琵琶、四弦、口弦等。舞蹈的动作矫健有力,生动活泼,节奏性强。傈僳族民间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作品。傈僳族服饰有的绚丽多彩,有的典雅大方,根据的颜色可分为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傈僳族民族艺术强调与升华民族精神,这些民族艺术唤醒了个体获得超越形象世界的更丰富、更深厚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悟,并感发、激励、净化了族人的心灵。绮丽

的傈僳族人文艺术,蕴涵了特定的民族意识和价值取向,它为儿童从自然走向社会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心领神会的、喜闻乐见的视听言语与思维符号,它传承了民族文化,增强了民族自信,弘扬了民族精神。

4、独特的传统节日,开辟了儿童的精神乐园

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山脉,也不是河流,而是揉进了个性的种族文化。傈僳族有许多传统的节日,主要有:澡塘会、收获节、过年节、刀杆节,但以“刀杆节”最为奇特。相传在明朝,外族入侵云南,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御敌。他依靠当地的傈僳族民众很快驱逐了入侵者。二月初八,王骥奉旨回京,不幸中途遇害。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和当时牺牲的抗战将士,傈僳族将这一天作为“刀杆节”,由此沿袭,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活动第一天“下火海”,即用柴烧成一大堆火炭,表演者赤脚踏火炭,“打火滚”即在火炭上翻滚,“洗火脸”,即捧起火炭洗脸;最后“拉火链”,即把烧烫的铁链子拿在手里互相传递,表演完毕群众一起跳舞。第二天“上刀山”,把32把磨得锋利的长刀,横绑在两根高四丈的木杆上,做成刀梯,勇敢者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进行爬梯表演。“刀杆节”是傈僳族人民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精神展示,它既是对参赛者体力与意志的考验,更是对参与者心灵的冲击与灵魂的震撼。傈僳族儿童正是在这类惊奇、紧张的活动,在勇敢者的熏陶与感染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坚韧、勇敢、团结、积极进取的个体意识和民族精神。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林崇德等. 心理学大词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2.
- [2] 刘豪兴、朱少华. 人的社会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07.
- [3] (美)斯蒂芬·P. 罗宾斯著. 孙建敏、李原等译. 组织行为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 Prentice Hall 出版公司. 1988, 524.
- [4] 陈世联. 新视角下的儿童社会化研究:以多元文化为价值取向.
<http://219.141.235.75/shxw/qsnj/t> 2005 05 17.
- [5] 陈会昌, 叶子.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 1.
- [6] 千里原. 民族工作大全[M]. 上海: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07.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Lisu Nationality's Custom and its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Yong-hua, FU Jian-hong

